

医学伦理研究之文化背景关注*

王云岭 曹永福 杨同卫 沈秀芹 郑林娟

摘要:医学伦理研究与文化关系密切,医学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医学伦理研究与文化的关系可以通过医学伦理的文化纷争与道德陌生者两个事实得到例证。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出对西方医学伦理理论的移植,而对中国社会特定文化背景的关注不够。立足民族深厚的文化背景,对外来研究成果进行本土化基础上的借鉴与吸收,将是发展中国当代医学伦理学的良策与必由之路。

关键词:文化;文化背景;医学伦理研究;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5)09-0034-03

Pay Attention to Cultural Background while Research on Medical Ethics WANG Yunling, CAO Yongfu, YANG Tongwei, et al. Medical Colleg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12, China

Abstract: To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on medical ethic and culture is interrelated. Medicine per se means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on medical Ethic and culture could be corroborated through the two facts of cultural dispute on medical ethic and moral strange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edical ethics in the present age means too much the transplantation of western medical ethical theories,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of Chinese society. Based on prof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society, using and referring foreign research production through localization would be a good plan and the only way to develop China medical ethics in the present age.

Key Words: culture; cultural background; research on medical ethics; localize

1 医学的文化内涵

我们无法考证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种类的医学体系。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确证的是,每一种医学体系都毫无例外地与产生这种医学体系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比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关系密切,有学者,如鲁桂珍和李约瑟,更追溯出针灸和道教渊源深厚^[1]。对这种医学哲学基础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对医学文化内涵的考察。

中医理论体系所蕴涵的是比西方医学体系中的那种工具主义理念复杂得多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医学并非一个单一的知识学科门类,而是被作为哲学、政治、社会、家国、人生等这个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医学有着超出西医仅仅针对疾病与健康这个单一主题以外的复杂文化涵义。《灵枢·师传》中说医学可“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始”。而这正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途径之一。

2 文化与医学伦理研究的关系

医学本身复杂的文化内涵使得医学行为不能被简单地看作针对疾病的工具性手段。对医学行为的合理性和人文主义性质的关注离不开对医学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文化的关注。文化与医学伦理研究的关系至少应该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探讨中得到阐释。

2.1 医学伦理纷争中的文化差异

山东大学医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2

*本文为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课题“医疗保健市场、道德与传统文化资源”成果之一

医学伦理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所存在的纷争,绝大多数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而且实际上,即便是医学伦理研究中所体现的不同侧重和倾向,也都是由文化的和合纷争和冲突交流造成的。石大璞甚至认为,没有文化的纷争和冲突便没有医学伦理的萌动。他进而指出,医学伦理的纷争与文化差异的三种层次相吻合,即与文化的地域差异、族际差异、时代差异相吻合^[2]。

与医学伦理研究相联系,文化的地域差异表现为不同国家民族对医学伦理的侧重面的不同,而各侧重面与各个国家民族经济、科技、体制的发展水准相关。詹姆斯·道尔在第二届中德医学伦理学研修班上曾经提出批评,在中国有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障,吸烟、酗酒,但医学伦理学教师却花大量时间来讨论谁是父亲、谁是母亲之类的问题^[3]。这正是由于中国教师们缺乏对文化的地域差异与医学伦理研究相关的敏感性。

文化的族际差异和时代差异,分别表现为宗教间的差异和医学伦理学理论中传统理论与新理论之间的差异。事实上,石大璞的研究指出了医学伦理研究中关注文化背景的重要意义。医学伦理研究者无法逃避特定的文化背景对医学行为意义的影响。而且,文化背景对医学行为合乎伦理或者有悖于伦理准则的确证是基础和关键的。

2.2 道德陌生者

道德陌生者(moral strangers)这个概念是由美国Rice大学哲学系、Baylor医学院教授H. Tristram Engelhardt首先提出并使用的。Engelhardt解释说,他使用这个概念,是指人们在卷入道德争论时,他们不能在

具体的道德观设想上取得共识时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这个共识,也就难以为解决矛盾提供基础了。这样,他们便认为彼此是在根据各种不同道德承诺而行事。当人们彼此作为道德陌生者相遇,那是说他们是在没有共同的道德承诺的环境中相遇,也就无法在原则上解决分歧和允许争论者把争论的问题的合作看成是根据完整的道德原则的正当之事。道德陌生者们把其他人的行动看成是道德上不能被证明为正当的行为,或者是比较坏的行为,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4]。Engelhardt 的道德陌生者概念很好地解释了诸如在临床上所遇到的耶和華作证派教徒拒绝输血的难题是怎样发生的。实际上,道德陌生者就是生活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相遇所形成的身份角色。显然,这根源于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只能通过诉诸于文化本身来解决。如通过文化的整合,即为双方提供一种互相承认的文化背景。Engelhardt 试图通过诉诸世俗人文主义这样一种崇奉或承认人的自主权和自我支配地位的认识来解决道德陌生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正是把世俗人文主义作为先验的文化共识来使用。这向人们表明,文化背景在医学伦理学研究中是多么重要!

3 关注中国医学伦理研究的特定文化背景

3.1 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之影响

在中国医德学^[5]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这种影响首先可以从对医学的伦理型定义中看出来。明代王绍隆《医灯续焰》潘楫赠注称:“陆宣公论云:‘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6]。仁是自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把医学定义为仁术,显示了医学成为儒家思想实践于社会治理的工具和手段。这种定义也决定了对医学的伦理功能的表述,即所谓“以医为孝”。中国医生在古代有儒医之称,实不足为怪。

历代医家所提出的医德规范无不渗透着儒学思想的汁液。这些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种医德文献,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龚廷贤的《万病回春》等。今天仍然能够从我国医生的行为规范中找到这些著名经典文献的影子。医学受儒家思想影响之严重,甚至连其对象和方法也都受到限制和选择。比如虽然古人早就认识到解剖学对于行医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儒家孝道观念的影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体解剖学和外科手术学一直不甚发达。清代名医王清任试图突破这一传统文化的限制,竟被说成是“教人于杀人场上学医道”^[7]。

3.2 当代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对医学伦理之影响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社会革命、文化运动等因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西学东渐带来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科学技术与民主观念,但也使

得中国传统文化遭到重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不仅影响到儒家思想的传承,还使得中医学遭受质疑,出现了中医学与西医学的论争^[8]。这种论争直接危及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社会革命和文化运动又使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受到打击,并在与外来文化的较量中被剪裁和整合。时至今日,尽管中医学被作为与西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相并列的三大医疗保健力量被写进 1982 年宪法,但是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医的辉煌相比较而言,今日中医的发展迟缓则是不言而喻的。与西医的强劲发展势头相比较,中医显得默默无闻,而且常受到排斥。这种状况使得中医思想体系中渗透着的德性观念对医生行为的影响受到削弱。事实上,这标志着在当代医学伦理发展中,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日渐减弱。

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不同,在当代中国社会,儒家学说似乎只存在于学术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那里,只有在学术研讨会上和大学课堂里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无足轻重,相反,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作为民族标志的儒家思想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而且实际上,尽管儒家思想不再起到政治上统摄人们思想的社会整合作用,但是以血缘亲情、孝道为标志的家庭观念和以诚信、守诺为标志的人际交往准则在中国民众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并对民众生活起到规范作用。

这种当代社会文化背景对医学伦理研究影响极大。尤其是以血缘亲情、孝道为标志的家庭观念,加上当代中国新起的集体主义思想,实际上成为与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文化传统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任何在中国从事医患关系和知情同意研究的医学伦理学家都不能忽视的。

3.3 建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之上的医学伦理研究

与很多学科一样,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受到西方医学伦理思想影响很大,如北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行善、无伤、自主、公正)今天被中国医学伦理学家普遍接受。看起来这种接受似无不妥之处,但是如果不考虑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在研究中仍然会遇到困难而出现两难现象。李瑞全已经注意到了医学伦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背景问题,他试图用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医学伦理思想进行吸收融合,以消弭文化背景带来的伦理困境,如他曾经尝试把北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学思想相通约^[9],虽然这种通约仍然有值得商榷之处。

尽管如此,台湾地区的学者关注文化背景的努力还是开出了一些硕果,如把移植于美国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成功地本土化为“生死教育”,使得讳言死亡的中国人较易于接受^[10],成就斐然。

关于当代中国医学伦理研究中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杜治政指出:一方面,随着医学科学研究的深度和规模的

不断扩大,国际合作愈来愈迫切,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不同,伦理道德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常常使国际间的合作难以进行。这就要求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走出国门,开展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取得某些共识,为国际间的合作提供支持。但他接着指出,医学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建立全球统一的医学伦理学,而是要在某些重要的伦理问题上取得共识^[11]。孙慕义则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伦理学给予的道德标准只是相对于各种文化而建立的,离开了它的生长土壤,它可能就失去了善恶判断的价值或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宽容来达到统一的全球伦理,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点的具体举措^[12]。且不论这种努力能否实现,他们对文化背景的关注都是非常明智的。台湾地区对西方研究成果本土化的经验对大陆医学伦理研究深具启示。这告诉我们,一方面,建基于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之上的医学伦理研究应该首先以合适的方法吸取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努力创新,创造出适应中国当代文化的新成果。所谓吸取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不是拿来主义,而是本土化,使这些成果能被中国文化吸收、同化而为国人接受。这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必将是医学伦理研究推陈出新,化解因文化差异产生伦理困境的良策。

参考文献:

- [1] 钮则诚. 生命教育——伦理与科学[M]. 台北: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157.
- [2] 石大璞,喻琳. 医学伦理与大文化论[J]. 中国医学伦理学,1994,41(3):3.
- [3] 王云岭,曹永福. 医学伦理学是否可教及其他——关于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再思考[J]. 医学与哲学,2004,25(6):47.
- [4] H. Tristram Engelhardt 著,李学钧,喻琳译. 生命伦理学和世俗人文主义[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4-5.
- [5] 陈晓阳,曹永福. 医学伦理学[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2.
- [6] 杜治政,许志伟. 医学伦理学辞典[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 230.
- [7] 王宜静,罗京滨,王少君. 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之影响[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3,17(4):52.
- [8] 甄志亚. 试论中国近代医学的文化背景、特点与趋势[J]. 中华医史杂志,1995,25(1):12.
- [9] 杜治政,许志伟. 医学伦理学辞典[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 86.
- [10] 钮则诚. 生命教育——伦理与科学[M]. 台北: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82.
- [11] 杜治政. 生物医学人体受试者研究未来面临的挑战[J]. 医学与哲学,2001,22(12):25.
- [12] 孙慕义. 论医学宽容——兼全球生命伦理是否可能[J]. 医学与哲学,2002,23(6):23.

作者简介:王云岭(1974-),男,山东省沾化县人,山东大学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收稿日期:2005-02-25

(责任编辑:张斌)

学术动态·

2005年国际生命伦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2005年6月27-28日,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医疗市场、道德与传统文化资源”为主题的国际生命伦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医学院召开。会议由山东大学医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和国际哲学与医学研究学会(美国)、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联合主办。

来自美国莱斯大学、圣路易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潍坊医学院、中国《医学与哲学》杂志社、《中华医学杂志》杂志社等国内外多所高校、学术期刊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山东大学,共同探讨了生命伦理学与医疗保健领域的热点问题。其中,国际著名医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专家、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美国莱斯大学哲学系 H. T. Engelhardt 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主任、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 Lai Po-wah Tao 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范瑞平博士;美国自由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Frederic J. Fransen 博士;美国休斯顿社区学院 Jeremy Garrett 讲师;圣路易斯大学卫生保健伦理中心 Ana Iltis 研究员;中国《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大连国际人文社会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杜治政教授;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李本富教授;中国生命伦理学界著名学者、原亚洲生命伦理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邱仁宗教授;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陈晓阳博士、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研究

所副所长曹永福副教授等作了精彩的发言。

在会议的两天的时间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中国医疗资源、市场与中国民营医院的发展;健康权利的实现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选择;中国和欧美国家保健政策面临的挑战;信任和责任的儒家伦理基础;医疗保健服务、市场和儒家道德传统;自由市场、私人保健机构和道德完整;市场、信赖和文化的滋养责任;多重道德含义的冲突;“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成本效率限制分析;公私混合市场中道德完整性的制度维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通过研讨,与会学者在医疗卫生服务改革方面达成许多共识,如医疗改革必须与伦理相结合,必须重新审视卫生政策的伦理基础;必须弘扬儒家传统,并使之与现代医学和市场经济的精神内核相契合;应该允许多元化的、多种价值取向的医疗机构并存,使之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应该认真研究欧美和东南亚国家医疗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医疗保健事业。

这次生命伦理学国际会议的召开,彰显了生命伦理学对当今医学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价值,也标志着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已逐步走向成熟,并成为现代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日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研究所 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 王云岭执笔)